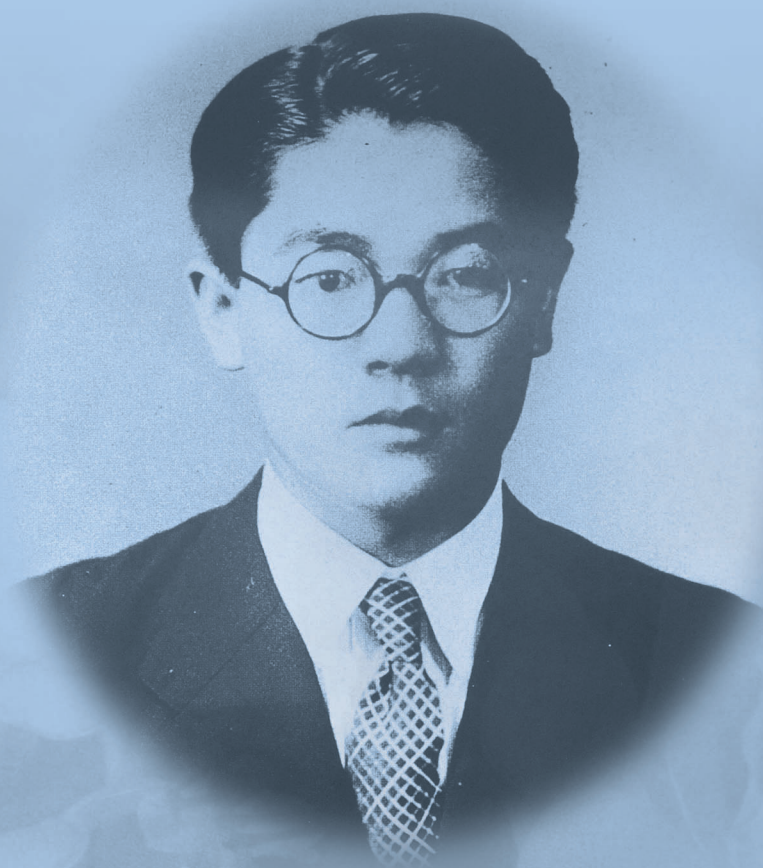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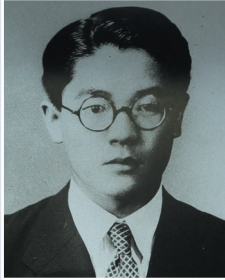
張漢裕

1913~1998

◆ 台灣農業經濟的奠基者 ◆

葉淑貞／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張漢裕老師於1913年6月2日出生，1998年10月29日辭世，享年85歲。他堅持教學工作達50多年，培育出無數優秀的學子。他一生從事研究工作更長達60年，在許多領域上長期居權威地位；在台灣戰前或戰後的實際經濟問題上，有許多獨特的發現。他的學術研究重視人的因素，在主題的選擇上非常具有系統，且又能排除非學術干預。這是因為他具有仁慈的心、冷靜的頭腦、負責的態度、勇者的風骨、敬業樂業的精神。

壹、前言

張漢裕老師於1913年6月2日出生，1998年10月29日辭世，享年85歲。他是我們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的先師前輩，無論在教學上或在研究上，都締造了豐碩的成果。

透過教學與研究，張老師啟迪了無數的學子與學者。張老師從1946年獲聘任教於台大經濟系之後，在50多年的教學生涯中，培育了無數優秀的學子。從36學年度任教以來，開授了將近20門的課程。其中，西洋經濟史始自46學年度，延續至83學年度；經濟思想史也起於46學年度，且持續到他去世；

而職業倫理的開授則從83學年度開始，當時他已經80高齡了。¹

如果從1939年發表第一篇文章算起，一生從事研究工作60年，以中、日、英文，發表了文章近百篇、著書10多種、譯著7種，在學術研究上創下了豐沛



1943年4月6日張漢裕老師與台灣民主、文化運動名人蔡培火的三女兒蔡淑玲結婚，由他的老師矢內原忠雄（下圖二排左）擔任介紹人。（後排右四為蔡培火）。資料：（《島國顯影》張尚一先生提供）

1. 關於張漢裕老師授課的歷程，參考葉淑貞，2005，頁163。

的成果，這些著作中的一大部分收集在張漢裕博士論文集。²

他的研究主題環繞於台灣經濟史、西洋經濟史、經濟思想史及職業倫理等四個領域。在這幾個領域中的許多課題上，張老師都是開創者，而且迄今都還獨居權威地位。在他的著書中，《日本企業經營之研究》以及《日本社會保障制度》，分別出版於1989與1992年，當時他已近80歲高齡。此外，也有將近20篇的文章，是在他70歲以後才發表的。

張老師在每一個十年階段，都有一個大的研究主旨。他在1940年代便對重商主義展開研究，並獲得豐碩的成果。接著，以研究重商主義所獲之殖民地政策的歷史為基礎，於1950年代轉而研究日治時代的台灣經濟，發現並提出了不少與眾不同的論點。隨後，在1960年代，集中精神闡揚 Max Weber 的學說。從1960年代底到逝世為止，就持續運用從重商主義以及 Weber 學說的研究中，所得到之職業倫理的理論，探究台灣與日本經濟的發展。此外，在1950年代發現當時農民的生活程度有惡化的現象後，在1970年代，也轉向戰後台灣經濟的

研究。⁴其中，台灣經濟史中的不少課題、職業倫理、西洋經濟史中的重商主義以及思想史中的偉伯（Max Weber）學說的闡揚，可以說都是台灣學界的權威。

為了表達對張老師無限的追思與感恩，本文將介紹張老師在學術上的成就及他的治學精神。⁴

貳、重商主義及偉伯學說的闡揚

張老師在西洋經濟史及經濟思想史的研究，迄今都還是台灣經濟學界的一枝獨秀。在西洋經濟史的領域中，對重商主義的研究，更屬國內學界的權威。而在思想史方面，對德國社會學家偉伯思想的闡揚，是他另一重要貢獻。在重商主義的研究上，有文章10幾篇，著書與譯著各1冊；在偉伯學說的研究上，有文章4篇以及譯著2種。⁵

從1939至1944年，張老師每年至少發表一篇重商主義的研究心得。這些文章中的6篇，後來在1954年集成《イギリス重商主義研究》一書，該書被學界稱為經典之作。此外，在1941年時，

2. 關於張老師的著作目錄，參見《張漢裕博士論文集(七)》，頁238-259；以下將《張漢裕博士論文集》簡稱為《文集》。

3. 關於張漢裕老師的著作目錄，請參考葉淑貞2005，頁164-173。

4. 至於張老師的學術淵源，可以參考黃紹恆，2001；而關於張老師的研究方法，請參考葉淑貞，2005。

5. 關於張老師這方面的著作，請參考葉淑貞，2005，頁134。

他就已經將重商主義文獻中最居重要的一書：*Thomas Mun, 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 (1644)*，翻譯成日文。這一系列的研究，除了為張老師往後的研究奠下堅實的基礎之外，也成為該領域研究的權威。

經由這些著作，張老師提出了他對重商主義的獨到見解。所謂重商主義大別為兩種：一種是財政性的；另一種是產業性的。只有後一種才對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有貢獻，其最純真的典型可見於17世紀30年代到18世紀中葉的英國。

資本主義的發展須要資金，而當時英國銀根短缺，因而從17世紀初以來，就有一連串的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之論爭，最早的論爭是主張重金主義的保護主義與湯姆斯曼（Thomas Mun）的自由貿易論間的爭辯。前者主張為增加國民的就業與財富之生產，應禁止金銀的輸出；後者認為禁止金銀輸出，將導致物價上漲，輸出減少。自亞當思密以來，一般都認為湯姆斯曼的主張超越重金主義。但是，張老師從17世紀初英國國

內生產性向旺盛，且未利用資源豐富的情況，認為當時重金主義之主張，比較有助於英國近世初期資本主義的發展。⁶

18世紀的重商主義較之前一世紀而言，已出現劃時代的變化。當時的保護主義領導者為查理士金（Charles King），他們的主張與前時代保護主義的主張相比，有重視消費、重視國內市場及主張自由貿易等三大轉向。這些轉向與18世紀英國經濟力量的提升有關。當時英國資金已豐裕，生產力也大幅提高。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主張保護主義的重商主義，乃轉向自由貿易的主張。張老師因而提出：這轉向及其理由暗示，亞當思密於半世紀後主張全面自由放任的歷史背景；而關於此點，應重新研究（張漢裕，1984b，201-238）。

在思想史方面，張老師最為人稱道的就是對德國社會學家偉伯學說的闡揚。張老師對偉伯的研究著作有四篇，除了介紹偉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之外，也詳細地闡述經濟學界對「資本主義」的各種定義。偉伯所謂的「資本主義」乃

6. 所謂生產性旺盛指的應該是提高產量的潛力相當大，一般我們認為如果資源已經達到充分利用，也就是充分就業的狀態，也就沒有多餘的資源可供利用，因此無法生產更多的物品。而張老師認為當時英國國內的生產性旺盛，且未利用的資源豐富，也就是說當時英國應該擴張產量的空間還相當大。重金主義的主張是為增加國民的就業與財富之生產，應禁止金銀的輸出；而自由貿易主義則認為禁止金銀輸出，將導致物價上漲，輸出減少。英國當時資源尚稱豐富，因此禁止金銀的輸出，不會導致物價的上漲，因為還未達充分就業的狀態，還有可用的豐富資源。相反地，自由貿易論之所以認為禁止金銀的輸出將導致物價上漲，乃是因為當時英國實施金屬本位的貨幣制度，因此在有貿易出超的狀態之下，如果禁止金銀的輸出，將使國內貨幣供給增加，則將使國內的需求增加，這時如果國內物資的生產不足以支應國內增加的需求的話，將會造成物價的上漲。但是既然張老師認為當時英國的資源還豐富，而且生產性旺盛，因此國內的供給可以增加到位以應付國內增加的需求的程度，將不至於導致物價的上漲。



1950年六月張老師(中坐者)與「中國經濟專題研究班」的學員攝於台大法學門正門。
資料：(《島國顯影》葉淑貞教授提供)

是指工業社會，「資本主義精神」則指實業精神或企業精神。而關於偉伯的研究，另有兩種譯著，一為中文，是偉伯不朽的名著《馬克司·偉伯：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張漢裕，1960）；另一者為日文，名稱是《マックス・ウェーバー：「儒教と清教」》（張漢裕，1958）。

經由張老師的這些著作，我們得以瞭解近代資本主義之所以成立以及資本主義精神是如何形成的。關於近代資本主義的成立，許多研究者都重視商業資本的角色，但偉伯提出這並非英國的發展路線。英國早期手工場主及勞工階級，主要由中小生產者階級成長演變而來。而關於資本主義精神的形成，偉伯認為最有力的因素是清教，且認為清教主

要的信奉者是中小生產者階級。從清教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所扮演的角色，偉伯提出一個社會如果有某種宗教，能有效培育制慾勤勞的職業倫理，則現代企業組織與工業社會之發展將愈強盛。

參、台灣經濟史

以1940年代對重商主義的堅實研究作為基礎，張老師在1950年代展開日治時代台灣經濟的研究，爾後於1970年代又將焦點轉向戰後。在台灣經濟史的研究中，張老師關懷的主題很廣，但是若從篇數或篇幅來看，則以農民經濟以及所得分配為最主要的焦點。這些研究所涵蓋的時間序列，起於日治時代，迄於戰後。⁷

張老師特別關懷台灣農家的生活，《文集（一）》的標題便是《經濟發展與農村經濟》，而在其它6冊文集中，也或多或少都有這方面的文章。在〈台灣農民生計之研究〉中，他比較了日治時代到戰後農民生活水準的變化。該文的研究結果顯示：農家的實質生活，在戰後的1950年代初期還低於1930年代的日治時代。又透過食、衣、住、行等許多指標，他也指出：戰前農家的生活水準

7. 關於張老師這方面的著作，請參考葉淑貞，2005，頁137-138的表2所列著作。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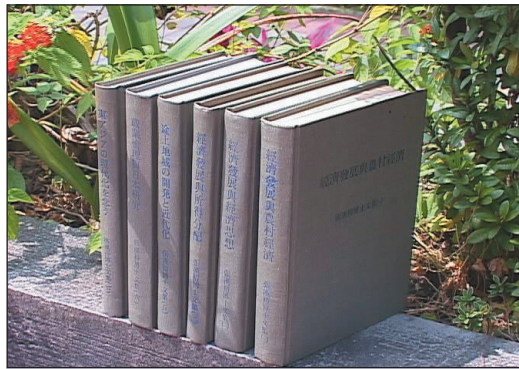
，已經不低了。在1950年代，選擇此一主題的研究，並敢於提出這樣的發現與結論，顯示了張老師的勇者風範。

該文中精闢縝密的每人熱量攝取量之估計，獲得國際學術會議高度的肯定。⁸該方面的估計與分析，迄今還無人能出其右。學者Ho（1968，1978），雖曾重新推算戰前台灣平均每人每日攝取的熱量，但是只是簡要地以每人消費的米與甘藷量，加以推算；張老師則逐一推算各項消費品的熱量。而在資料性質上，Ho用的是總體資料，張老師用的則是家戶個體資料。此外，張老師的估計方法也比較精細。⁹由於這些差異，兩人所獲結論也有相當的歧異。

發現1950年代農民的生活程度有惡化的現象後，張老師接著在1970年代，將研究焦點轉向戰後經濟的研究。那麼，台灣人民的生活水準在戰後何時才開始改善呢？根據〈台灣人民生活水準之測量〉一文的研究，全台可支配所得、消費支出及儲蓄，在1961-68年間，成長率低且不穩定；直到1968年間，才有持續而高度的增長（張漢裕，1984a，頁193-234）。不過，在此一期間，農

民的生活水準，雖也有相當的改善，但若與非農民相比，卻仍然偏低。這個結論促使他更進一步探討1950、1960、1970年代，農民相對所得的變化，並解析其間的影響因素。在〈台灣農家所得的變化及其影響因素的分析〉一文中，他指出原因在於該期間農家相對扶養率較重、交易條件不利、與國民農糧消費增加率比國民所得增加率落後等3個因素（張漢裕，1984a，頁71-128）。

張老師又從農、非農間所得差距的探討，擴大到全台家庭所得分配的變化趨勢。關於所得分配的變化趨勢，學者指出許多已開發國家，在長期成長的早期階段，所得分配的不均度有擴大的傾



張老師探討1950至1970年代影響臺灣農民所得的因素，也為研究日治時代台灣農民生活與經濟發展奠定紮實的基礎。其研究書籍集成《張漢裕先生全集》。

8. 在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協會（SSRC）與美國學術會議日本研究委員會，於1979年聯合舉辦之「日本殖民帝國」學術會議中，獲得高度的評價，（見文集（二）P.XII的說明）。

9. 詳見葉淑貞（1994a，1994b）的討論。

向，直到後期階段才趨於平均化。然而，關於台灣所得分配的變化，許多研究卻提出，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呈均等化的趨勢，因而將此一現象視為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奇蹟。但是，張老師的研究卻指出：（1）在1953-1973年間，1968年以前的所得分配有不均等化的趨勢，該年以後才轉為均等化；（2）儘管分配平均化了，但此一現象並不穩定，所以應該預防分配差距之再度擴大（張漢裕，1983a，頁 49-88、頁 89-92；Chang Han-Yu，1983，PP.112-137）。

而台灣總督府為了開展台灣的經濟，在統治初期便經由土地制度的改革，而建立了現代化的財產權；統一幣制與度量衡；建立現代化的交通系統。這些基礎設施的建立降低了交易成本，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發展。總督府又從技術的改革，開發米糖等產業。米穀技術的開發最重要的是蓬萊米技術的研發；而糖業的開發包括甘蔗農業與砂糖工業兩方面。在蓬萊米與甘蔗技術的變革中，政府扮演了品種引進與改良、水利灌溉設施的投資、獎勵化學肥料的使用等等角色。而在現代化糖業的建立上，政府更是不遺餘力，推出了不少補貼政策，又建立原料採取區域的制度。這些措施都是促使糖業在短期內快速發展起來的重



張老師一生從事研究工作60年，發表中、日、英文文章近百篇、著書10餘種、譯著7種等。是開創臺灣經濟史科學方法研究之先鋒。

要因素。

這些技術的開發與快速的推廣，主要是透過中央與地方政府部門的研究機構與農會組織。為何這些機構與組織能夠有效率地運作起來？為何各種政策能夠適切地達到目的？這與日治初期總督府所羅致的一群具有強烈事業精神的官僚有關，他們所制訂的殖民地開發政策基本上也是後繼總督努力的方向。張老師在〈日據初期殖民地開發政策〉一文，對這一官僚團體有以下形容：「這團隊以後藤為中心經常集會。他們發掘問題，擬定新的政策，後藤經常加以鼓勵、批評，要求更好更有效的表現。」

後藤以任務之重，責任之艱巨，鼓舞這團隊，以期望能實現他和兒玉所懷

抱的遠大目的。」¹⁰

而歲入的穩定增加支應了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財源，那麼政府歲入的穩定增加是否構成台灣人沈苛的負擔呢？張老師分別從政府的歲入結構、台日人平均每人稅額與稅率、以及政府的支出結構來解答此一問題。他發現政府的收入主要用在經濟發展事業上，而人民食、衣、住、行等生活方式與品質有相當的改善。綜合多種論據，最後提出：人民的財政負擔雖然不輕，但是政府財政也促進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張漢裕，1984a，頁395-502）。此處政府財政促進人民生活水準改善的論點，與前述農民生活水準研究中，所發現之戰前生活水準已經不低的結論，有相互呼應之效。

張老師的此一論點不同於戰後其它相關研究的主張。對於此一課題的研究，戰前以矢內原（1929）與北山（1934）為主。矢內原主張負擔苛重，戰後的周憲文（1958）與黃通等人（1987）延續此一論調。北山主張負擔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重，張老師則延續北山的觀點。經由對日治時代的研究結論，張老師不僅提出了好些與他人迥異的看法，也對日

治時代的經濟進行了相當全面且有系統的分析，對於有志研究日治時代的後輩學者有相當的助益。

肆、職業倫理

受到偉伯學說的影響以及自己研究重商主義的心得，張老師自然特別重視現代職業倫理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從1960年代起，張老師的研究就延伸到職業倫理這個領域。並且有感於職業倫理的觀念須及早深植人心，他也於1983年開始開授該方面的課程。在台灣經濟學界中，職業倫理的研究領域，張老師可說是開創者，令人惋惜的是，迄今這方面的研究仍然十分稀少。¹¹

在職業倫理的研究中，張老師觀察



1943年張老師於研究室的照片。
資料：（張尚一先生提供）

10. 本文原以英文發表，文章名稱為“Japanese Colonial Development Policy in Taiwan, 1895—1906: A Case of 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ship”，後來蒯通林先生將之翻成中文，刊載於《文獻專刊》16：3；後又輯錄於文集（二）。

11. 張老師該方面的研究成果，見葉淑貞，2005，頁142的表4所列各文中。

到在西洋世界中，發達的現代工業社會普遍具有勤勞、誠實、篤信、敬業、樂業等風氣。因而在〈論現代工業社會的企業家作風及職業倫理〉一文中提出：「這種觀念與作法，在工業社會裡並不限於企業家這一階級本身，在經理人員、技術人員以及勞工之間亦有相當顯著之表現。甚至於營利性企業以外的普通及專門性職業的人員，如公務員、教師、研究者、醫師等行業中亦不乏這種觀念與作法。」（張漢裕，1984b，頁47-56。）

張老師也應用偉伯學說，研究日本經濟，所獲得的研究成果發表於〈職業觀念與技術變遷〉（張漢裕，1994，頁25-40）《日本企業經營的研究》（張漢裕，1989）以及“The Japanese View of Business and Work”（張漢裕，1995，頁140-180）等論著中。受到偉伯所主張之經濟與宗教的關係之啟迪，張老師進而探索日本德川時代以來的武士道、佛教、儒教，以及一些特別具有職業倫理與經營文化意義之人物團體的思想理念。他發現這些人的精神薪火相傳，生生不已，提高了二次大戰後日本年壯經營者的經營理念與成就。

在1970年代初，台灣經濟正面臨一個轉型時，張老師也從職業倫理的研究

，勉勵企業家發揮現代職業倫理精神。他說：「我們的經濟現正處於一重要轉機。因而，如果要在世界市場中仍然屹立生存，則非提高勞動、技術、經營的品質不可。這除須要提高知識技術、激勵、加強經營以外，根本就要以提高職業倫理、企業家精神為基礎。而提高職業倫理，又如同一切倫理教育，唯有領導人物、師長以身作則去教化薰陶，是不待言的（張漢裕，1983a，頁289）。」另一方面，他也強調有志貢獻於學術的人，必須專業於學術工作。他說：「學術研究者若不把握有限的時間與精力，專門貢獻於學術工作，很難在有生之日留下有價值有份量的成果（張漢裕，1983a，頁285-291）。」

伍、治學精神

張老師除了在好幾個研究領域具有權威地位，在研究主題的選擇上特別重視人的因素，且研究具有系統性，最後且最重要的，就是他能排除非學術因素的干擾。而他的研究之所以具有這些特點，乃是因為他在學術研究上具有一些個人的特質，這些特質形成了他個人獨特的治學態度。

一、學術研究的特點



張老師於台大校園拍攝。

資料：（《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篇(七)》葉淑貞教授提供）

從前面幾節的介紹中，我們發現張老師在重商主義、偉伯學說、職業倫理等領域的研究，迄今在台灣都還獨領權威地位；而在台灣經濟史中的農家生活水準、所得分配、日治時代人民的財政負擔等許多問題上，也都提出了獨到的見解。而他之所以能獲致這些成就，主要是因為他的學術研究具有幾項特點：特別重視人的因素，在主題的選擇上非常具有系統，而且又能排除非學術的干預。他的研究以人們實際碰到或發生的經濟問題為中心，因此非常重視人的因素。曾在一篇學生的訪問稿中，當學生問他對於現在經濟學強調數學工具，有

何看法時，他說：「經濟行為有人，各民族社會人的感情思想制度習慣不同。institution 不同，behavior 也不同，reaction，function 也就不同，也就是應該有不同的 model。由於各個國家的特殊性，不能只靠計量的 model（張漢裕，1983a，頁333）。」

而且在主題的選擇上非常具有系統。例如40年代的重商主義、50年代的台灣戰前經濟、60年代的偉伯研究、以及70年代以後的台灣戰後經濟與職業倫理。而台灣經濟以及職業倫理的研究，則是以先前對重商主義及偉伯學說的研究，作為理論基礎。又無論對戰前或戰後研究，所發表的一系列論著，其間的主旨也都有關連，尤其是具有因果關係。透過這種系統性的主題選擇，才能讓他洞見到前人所未發現之事實。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能以勇者的精神，排除非學術因素的干擾。在研究課題的選擇與結論的提出上，在在都顯示了他勇者的風骨。在解嚴以前，特別是1950年代，許多人不敢觸及許多課題；既使觸及也不敢深入分析；就算進行分析，也多流於帝國主義論的框架。然而張老師卻敢於選取因政治因素所致，致使別人不敢觸及，但又是當時經濟問題中的重要環節。農民生活水準的變遷以

及日治時代台灣人的財政負擔的研究，以及從中所獲結論的公諸於世，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在他的時代或甚至直到解嚴以前，儘管有一些研究像他一樣，或是環繞於日治時代的經濟問題，或者對戰前與戰後的經濟問題作比較分析。然而這些研究的方向都集中於生產技術和生產力的探討，甚少深入分析臺灣人民生活水準的課題，即使有也多僅是蜻蜓點水般地觸及而已，而且往往流於帝國主義剝削的意識型態論。

張老師是第一個有系統探討此一課題的學者，內容以〈台灣農民生計之分析〉一文為題發表。他的一些這樣的文章曾引起一部分人士的擔心或不悅，例如〈台灣農民生計的研究〉一文投稿至《台銀季刊》後，台銀雖願意付稿費，但對於發表與否有虞慮；也有人從旁告訴他，那文章若發表，可能對他不利。但他卻表示：願意退稿費，不過要珍惜保留發表的自由（張漢裕，1983a，頁288）。

二、治學態度

張老師的學術研究之所以具有上述這些特點，乃是因為他具有一些獨特的個人特質：仁慈的心、冷靜的頭腦、負

責的態度及勇者的風骨，而他的治學態度更是具有敬業樂業的精神及長久的時間概念。而這些特質乃是受到幾位經濟學大師，例如西洋學者亞當斯密、馬夏爾與東洋學者矢內原忠雄、大內兵衛等人的薰陶。

在選擇研究主題時，秉持著仁慈的心。曾在接受學生訪問時，他說：「Marshall 主張經濟學家應具有 warm heart（溫暖仁慈的心），cool head（冷靜的頭腦）。其本為數學家，後來看到倫敦貧民窮苦的情形，激發了仁慈心，想使他們脫離貧窘，因而研究經濟。我們在研究時，也要像馬夏爾一樣，以溫暖仁慈之心為出發點，俾能找對問題（張漢裕，1983a，頁335）。」因為懷著這樣的胸懷，他特別關心台灣農家的經濟以及所得分配等層面的問題。

以仁慈的心與冷靜的頭腦進行研究工作的態度，乃是受到馬夏爾的薰陶。他曾說：「這樣的研究態度，才能對任何社會、民族、國家的經濟也好，政治也好，究竟對不對或應如何辦法，加以正確的科學分析乃至判斷。」冷靜的頭腦使他的研究得以擺脫意識型態的束縛，而此一精神可能也受到亞當斯密的薰陶。亞當斯密在研究英國重商主義時代，殖民地的開發政策帶給殖民地人民的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Ⅳ

利弊損益等問題上，便拼棄意識形態與民族感情的價值判斷，而作冷靜客觀的分析與科學的評估。張老師也本著這樣的精神，看待日治時代的經濟問題。

仁慈的心促使他的研究以人的問題為關懷的核心。他之所以特別強調人文因素，其來有自。在學生訪問他時，他曾說：1930年代是我一生中的黃金年代，在高等學校所受的教育真的是自由教育，校長、教師都努力從事於「人」的教育，皆有為國家、社會造「人」的志

氣。這種特質可能也是受到幾位經濟學大師的薰陶。他曾說亞當斯密的道德哲學是很廣的，涵蓋了倫理、文化科學，甚至較社會科學還廣。他稱文化及社會科學為道德哲學，是一種研究「人心」的學問，亞當斯密是位「人心」學者（張漢裕，1983a，頁333）。

此外，張老師也曾指出米爾及馬夏爾都把人性、品格的研究，納入財富經濟的研究。例如在馬夏爾的《經濟學原理》第二頁便說：「一面，經濟學是財



1935年張漢裕老師考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在東大赤門前留下入學紀念照，東大以培養日本文官著稱，故其校門稱「赤門」，又稱「朱門」（官府之門）的意思。（左一持帽者為張漢裕）

資料：（《島國顯影》張尚一先生提供）

富的研究，更重要的另一面，是人的研究。」所以，張老師在1991年，中國經濟學會召開的「政治經濟研討會」的理事長專題演講中，語重心長地提出，經濟學者要效法這些前輩，在經濟研究中注入人的因素（張漢裕，1994，頁3-7）。



1994年退休歡送會上與師長同仁合影。左起：林大侯、張漢裕、黃金茂、右一許嘉棟。資料：（《從帝大到台大》黃金茂教授提供）

負責任的態度使得他的見解都有堅實的論據作為基礎。他曾說治學與做人，都要秉持著「真知」的精神。所謂真知就是「有三分說三分，沒有就說沒有，『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知』是要相信，到此程度，才是『真知』，無論學術的，生活都是如此，也唯有這樣才能讓人相信（張漢裕，1983a，頁336）。』秉著真知的態度治學，以堅實的論據作為基礎，張老師的研究以及發現才能一直到今天都還有其存在的價值。

勇者的風骨以及負責任的態度使他能夠排除非學術的干擾，將獨到但可能

對自己不利的發現公諸於世。他這種維護真理的精神是從他的老師矢內原忠雄那兒學來的。¹²他曾說：「我在東大，最初參加的 seminar 就是矢內原師的那一班，他的課是殖民政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等書。我從老師那兒學來的就是他敢於維護真理的精神。所謂真理，不但是學術上的，也是道理上的真理。我們除了談真、求真之外，還要衛真、維護真理，縱令千萬人，該說不是就說不是，該說是就說是，這種無畏的精神如今是最難能可貴的（張漢裕，1983a，頁330）。」

敬業樂業的精神，使他一生專業於

12. 矢內原以敢言著名。他在中日戰爭開始時，曾因「日本國沒有滅亡，則不會重生。」一語而遭筆禍（張漢裕，1983a，頁330）。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Ⅳ

學術研究，而且直到去世時，都還致力於研究與教學工作，因而能夠獲得豐沛的研究成果。他常提起留學東京大學時代的一位老師大內兵衛教授的話：「學術工作或成績，好比是屋簷上滴下來的雨水，經過很久很長的歲月，才留下一點點水垢在石頭上，而常為人所忽略。」這句話常提醒著他，必須把握有限的時間與精力，專業於學術工作。他的敬業樂業精神是眾人皆知的。他常說：「做學問要像唸『經』，要有恆心、天天唸、天天想、天天做，才会有結果。工作尤其是精神上的工作最初與修行一樣是痛苦（pain），但透過專業、敬業的過程後，反而會感到樂趣（pleasure），變成樂業（play），苦中有樂了（張漢裕，1983a，頁334-335）。」

在他的研究當中，時間序列都拉的很長。這種重視時間因素的精神可能與他研究經濟史有關。歷史的研究就是從時間的推移中，觀察問題發生的因果或史事的演變。時間序列可以無限地向前推，只要史料存在，而且又有必要。文化制度是一個社會人們的行為習慣所組成，人們行為習慣的形成與轉變通常要歷經相當長久的時間。所以，舉凡真正關懷經濟問題與文化制度之關係的研究者，其內心世界的時間觀念是相當長久

的。張老師內心世界的時間概念長久，這可能是他得以堅守教學崗位50多年，致力研究工作60年的關鍵因素之一。

陸、結論

張老師的學術成就就可以歸納為四方面：（1）在教學上，他堅持教學工作達50多年，培育出無數優秀的學子；（2）在「許多」研究領域上「長期」居權威地位；（3）在台灣戰前或戰後的實際經濟問題上，有許多獨特的發現；（4）從著作的數目來看，也有豐碩的成果。這些成就的獲得與他獨特的治學方法與治學態度有關。他的學術研究具有幾項特點：特別重視人的因素，而在主題的選擇上非常具有系統，而且又能排除非學術干預。這是因為他具有仁慈的心、冷靜的頭腦、負責的態度、勇者的風骨、敬業樂業的精神、長久的時間概念。而張老師的這些精神，是我們效法的對象，不只是學術界的我們，其他領域的我們，也需要這樣的精神。

參考文獻

- 北山富久二郎著，周憲文譯（1959）。
日據時代臺灣之財政。收於臺灣經濟史八集（87-163頁）。臺北：臺灣銀行。（原書成於1934）

-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1964）。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臺灣銀行。（原書出版於1929年）
- 周憲文（1958）。日據時代臺灣經濟史。臺北：臺灣銀行。
- 張漢裕（1958）。マックス・ウーエーバ：「儒教と清教」。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アズア文化研究委員會。
- 張漢裕（1960）。馬克司・偉伯：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臺北：協志工業叢書。
- 張漢裕（1983a）。經濟發展與所得分配：張漢裕博士文集論文集（三）。臺北：張漢裕博士文集出版委員會。
- 張漢裕（1983b）。途上地域開發と近代化：張漢裕博士文集論文集（五）。臺北：張漢裕博士文集出版委員會。
- 張漢裕（1984a）。《經濟發展與農村經濟：張漢裕博士文集（一）》。臺北：張漢裕博士文集出版委員會。
- 張漢裕（1984b）。《經濟發展與經濟思想：張漢裕博士文集（二）》。臺北：張漢裕博士文集出版委員會。
- 張漢裕（1989）。日本企業經營之研究。臺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經濟研究處。
- 張漢裕（1992）。日本社會保障制度。臺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經濟研究處。
- 張漢裕（1994）。職業倫理與日本研究：張漢裕博士文集論文集（六）。臺北：張漢裕博士文集出版委員會。
- 張漢裕（1995）。東アジア現代化を念う：張漢裕博士文集論文集（七）。臺北：張漢裕博士文集出版委員會。
- 黃通、張宗漢、李昌瑾（1987）。日據時代臺灣的財政。台北：聯經出版社。
- 黃紹恆（2001）。張漢裕老師的學術源流考。載於張漢裕教授紀念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大經濟研究所學術基金會。
- 葉淑貞（1994a）。論台灣經濟史研究的歷史解釋觀點。載於經濟論文叢刊，22：4，477-503頁。
- 葉淑貞（1994b）。台灣「新經濟史」研究的新局面。經濟論文叢刊，22：2，127-167頁。
- 葉淑貞（2001）。張漢裕教授的學術成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Ⅳ

就。載於張漢裕教授紀念研討會
論文集。35-76頁。臺北：臺大
經濟研究學術基金會。

葉淑貞（2005）。台灣經濟史大師—張
漢裕教授的學術成就。兩岸與國
際事務季刊，2：1，131-172頁。

Chang Han-Yu（1983）。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aiwan*. Taipei：Ho-Yu Printing Co.

Ho, Samuel P.S.（1968）。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under Colonialism：
the Case of Taiwa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8：3, 313-340.

Ho, Samuel P.S.（1978）。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60-1970*.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